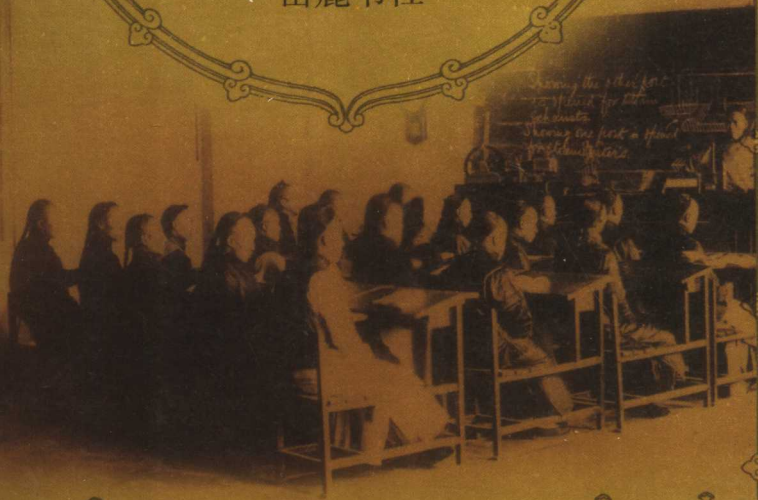


中国近代 思想与思潮

ZHONGGUO JINDAI
SIXIANGYUSICHAO

郭汉民 / 著

岳麓书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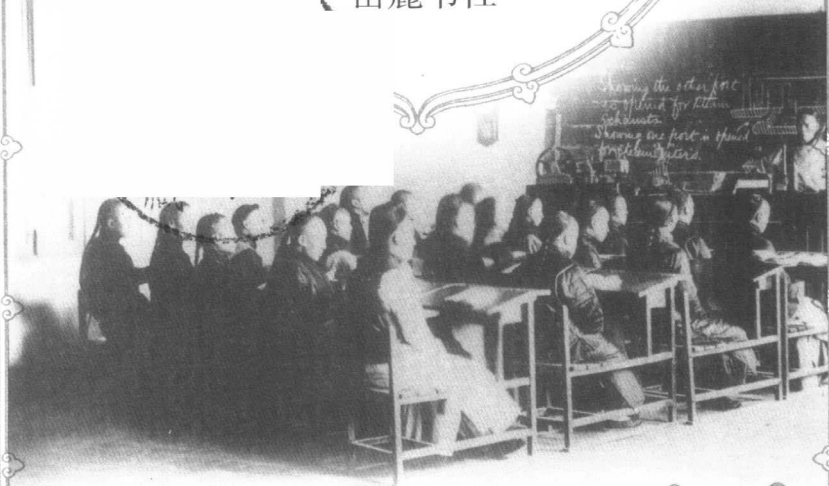


中国近代 思想与思潮

ZHONGGUO JINDAI
SIXIANGYUSICHAO

郭汉民 / 著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与思潮/郭汉民著. —长沙:岳麓书社

2005

ISBN 7—80665—173—X

I. 中... II. 郭... III. ①思想史—中国—近代—文集 IV. B25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9840 号

中国近代思想与思潮

作 者:郭汉民

责任编辑:饶 毅

封面设计:黄 朝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13.875

字数:359 千字

印数:1—2,000

ISBN7—80665—173—X/G·416

定价:24.00 元

承印:长沙利君漾印刷厂

地址:湖南省宁乡县宁株路中小企业发展园

邮编:410600

电话:0731—7801378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自序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在近代思想与思潮研究方面一部分论著的结集。大略分为五组。

第一组是思想家的思想个案研究，包括近代中国首任驻外使节郭嵩焘的护侨思想、早期维新思想家和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薛福成的侨务思想、寓华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来华初期的社会改革思想，梁启超早年的文学革命思想、反满思想和利用外资思想以及孙中山、梁启超对文化问题的思考。这篇文章都是对有关思想家某一方面思想的个案分析。这些问题都是先前人们没有专题研究或研究不足的。郭嵩焘、薛福成在保护华侨和发展侨务方面的思想主张具有鲜明的创新性质和积极意义，以往谈的不多，值得加以研究，对今天的侨务工作仍不乏启示作用。李提摩太来华初期即以“中西友”的名义在《万国公报》上连续发表《近事要务》，内容十分丰富，对当时的中国士大夫阶层富有启示意义，笔者据以分析和概括李提摩太的社会改革思想，也是先前人们不曾涉及的。梁启超作为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和宣传家，其流亡日本初期的反满思想、文学革命主张、利用外资思想，学界多有涉及，笔者有所感而特作专题论述。他的文化观亦有学者论及。笔者将其与孙中山加以系统比较，发现孙梁这两位大致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广东人，虽然政治立场截然对立，但文化观念，诸如对传

统文化、对西方文化及中西文化关系的看法，总的说来却有着惊人的一致。这似乎表明，政治观点不同乃至对立的中国人可以而且应当在文化观上找到共同点。

第二组文章仅三篇，从宏观上考察晚清社会与晚清思潮的关系，分析晚清主流思潮的发展演变及其社会历史条件，国民性改造思潮的产生发展及其意义，并大略勾勒出晚清禁烟思想的发展与演变过程。

第三组文章较多，有十一篇，比较系统地探讨从鸦片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之间主要的社会改革思潮，包括经世思潮、洋务思潮、维新思维、立宪思潮。认为鸦片战争前后以龚自珍、魏源为主要思想代表的经世思潮，大胆揭露时弊，倡言“更法”与“改革”，开了近代社会改革思潮的先河，其开眼看世界架起了一座从传统走向近代的桥梁。咸同年间以郭嵩焘、冯桂芬、容闳、洪仁玕为代表的变革思潮反映了学习西方、实行变革已成为时代要求。随之而起的洋务思潮对“千古变局”以及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有着清醒的认识，欲师夷长技以求强、工商立国以求富、变更科举和兴办学堂以求才以及采取“中体西用”的文化政策，成为19世纪60—90年代先进中国人的共识。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兴起和西学的初步传播，在洋务思潮的母体中逐渐孕育出了早期维新思潮，其思想特征是支持商办企业，追求“君民共主”。甲午战后，变法维新思潮勃然兴起，迅速高涨，并在戊戌政变之后获得了深入的发展。以戊戌政变为界标将变法维新思潮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并充分估计戊戌后维新思潮的积极意义，是笔者的“一家之言”。此后，君主立宪作为一种声势浩大的社会思潮，与反清革命思潮同时并起。这两种思潮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中下层的愿望。君主立宪思潮以梁启超、杨度、张謇、汤寿潜等人为代表，宣传立宪救国、政党政治、国会制度、责任内阁、司法独立、地方自治以及君主不负责任等宪政理论，接二连

三地发起国会请愿运动，希望通过和平改革，根本改造清王朝的君主专制，建立西方式的君主立宪政治体制；反清革命思潮以邹容、陈天华、章太炎、孙中山等人为代表，宣传排满、光复、民主共和，发动前仆后继的武装起义，希望通过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建立民主立宪的中华民国。这两种思潮构成清末社会思潮的主流，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人数之多，影响之巨，在近代社会思潮发展史上都是空前的。这两种思潮虽有分歧、有矛盾，甚至有过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改变清王朝的专制主义统治，追求国家政治生活的某种程度上的民主化，却是一致的。而且，在革命派忙于暴动、暗杀一类“武器的批判”的时候，立宪思潮却拿起“批判的武器”大规模地、深入系统地宣传西方的宪政理论，批判君主专制，批判清王朝“名为立宪，实则专制”的本质，做了革命党人所忽视的思想启蒙工作。事实上，正是这两种思潮共同冲击着清王朝专制统治的基础，而当清王朝压制立宪运动且违背立宪精神强行组织“皇族内阁”时，也就人心丧尽，将自己的统治置于空前孤立的境地而走到了垮台的边缘。随后，武昌起义，各省响应，统治中国 268 年的清王朝只好在土崩瓦解之中退出历史舞台。

第四组文章四篇，是对五四时期胡适的实验主义、科学与人生观问题的论战以及新文化运动主要舆论阵地《新青年》研究状况的述评。这篇文章都是与学生合作完成的。

最后一组文章，两篇书序，一篇书评。书序之一是为我的第一位博士生杨代春的博士论文《〈万国公报〉与中西文化交流》作序，这篇博士论文获得了湖南省优秀社科著作的出版资助。书序之二是为我的朋友彭平一教授《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一书所写的序言。一篇书评写于 1986 年。那时才华横溢的史学新秀熊月之兄将他的新著《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寄给我。我通读之后，非常兴奋，也有所感，于是欣然命笔，写成九千余言的读后感

言，有赞誉，也有切磋，寄给月之兄，后经陈旭麓先生推荐，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上。

我与近代思想和思潮研究发生关系是在1989年师从林增平教授攻读中国近现代史硕士学位之后。硕士论文《论康梁异同》是我涉足近代思想领域的开始。这篇论文在《近代史研究》专刊《近代中国人物》第二辑上全文发表，曾给了我一个极大的鼓舞。毕业留校任教之后，我开设中国近代思想史课程，教学相长的规律促使我继续在这个领域中学习、探索。接着，吴雁南先生约我参与清末社会思潮和整个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研究，从而使我这样一位既无家学渊源、又才智平平的中年后学，经过不懈的努力，也能有所发现，也可以在某些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不至于人云亦云。通过研究，我在比较之中对近代思想家们的社会改革思想产生浓厚的兴趣，因为正是社会改革才能最有效地促使整个社会实现有序地进步。

在本书编辑的过程中，杨代春博士以及我的研究生戴兰华、芮红磊反复校对书稿，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李声笑同志也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2004年10月2日

湘潭大学北山

目 录

自 序	(1)
简论郭嵩焘的护侨思想与活动	(1)
浅析薛福成的侨务思想	(13)
李提摩太来华初期的社会改革思想	(26)
孙中山与梁启超对文化问题的思考	(41)
梁启超利用外资思想述论	(58)
梁启超早年的文学革命思想与实践	(70)
戊戌后梁启超的反满思想	(81)
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简论	(94)
晚清禁烟思想述论	(102)
晚清社会与晚清思潮	(113)
鸦片战争前后的经世思潮	(127)
咸同年间的变革思潮	(148)
洋务思潮的兴起及其基本主张	(163)
早期维新思潮与洋务思潮异同论	(188)
变法维新思想的兴起	(201)
甲午战后维新思想的高涨	(220)
戊戌后维新思潮意义辨析	(246)
君主立宪思想的兴起	(257)

君主立宪思想的发展·····	(272)
君主立宪思想的高涨·····	(290)
君主立宪思想与辛亥革命·····	(306)
杜威实验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327)
胡适与实验主义·····	(348)
关于科玄论战的几个问题·····	(372)
1949 年以来《新青年》研究述评·····	(385)
《〈万国公报〉与中西文化交流》序·····	(413)
《中国近代启蒙思潮》序·····	(418)
中国近代通向民主的曲折之路 ——读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	(426)

简论郭嵩焘的护侨思想与活动

郭嵩焘在出使英法期间提出了许多保护华侨的思想主张，并身体力行，从事了一系列保护华侨的外交活动。对于这一问题，以往学术界鲜有涉及。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一

19世纪后半期，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正处于迅猛增长的时期。各国与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殖民地市场成了世界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欧洲各国都注目于开发南洋及新大陆。奴隶制又适于此时废止，工资低廉的中国劳工，逐渐出现于南洋及新大陆各地，海外华侨社会也由此而形成和发展起来。到郭嵩焘出使欧洲前后，海外华人虽然受到西方殖民者的约束，但在贸易、开矿等行业中却往往占优势地位。尤其在吕宋、噶罗巴、婆罗洲、苏门答腊、澳大利亚等地，华人几乎垄断了商矿和种植园经济。而清政府长期以来推行的闭关锁国的政策，惩治出洋人民，也不准华侨回国。对于出洋谋生的人民，

尤其是大量出国的契约华工，漠不关心。华侨由于得不到来自祖国的保护，往往被西方殖民者和当地土人欺压，成为孤立无援的“海外弃儿”。

郭嵩焘在署理广东巡抚任上，就接触到了华工问题，对海外侨民受欺凌、遭迫害、缺乏祖国保护的痛苦境遇，有一定的了解，并产生了深切同情。1866年，广东新兴县裹洞、天堂等村被恩平客匪劫掠了一些良民。匪徒对于其中的富人敲诈勒索，而将穷人转卖出洋，以交换洋炮、军火等物。县令彭貽荪将此案禀告郭嵩焘，请他照会法、英各领事，以截留被拐卖的人员。郭嵩焘了解到被掳卖的贫民“父母妻儿，惨遭远别，朝夕啼泣而望”，一方面饬令地方官出示严禁客匪掳捉；另一方面照会英国领事罗伯逊，请截留给还被卖出洋的贫民，并照会法国领事知悉。然而，英国领事在盛气凌人的照复中，不仅不为查办，反而指责中国官方不设法禁止本国匪徒，“倘谓本国有招人前往外国工作之举，则必知省城开设分所，派官管理……何至有强卖人身之弊”^①？这样一来，掳人转卖一案，就在这一番不成功的对外交涉中不了了之。尽管如此，在多次办理此类涉及侨民的事务之后，郭嵩焘逐渐对侨民问题产生了基于民族立场的关注，并将有关事务列入自己的职务范围之内。

光绪二年（1876），郭嵩焘奉旨出使英国，这使他有机会直接接触西方文化和正在形成中的海外华侨社会。在出使前夕，他在奏折中提到“美国及日本各海口，中国流寓数千人至数十万人，交涉纷繁”^②。

使西途中，郭嵩焘亲身考察了新加坡。新加坡是南洋地区中国商民贸易繁盛之地。华侨约20万人，其中广属约7万之多。

①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1866年3月29日。

② 《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65页。

当地著名侨商胡璇泽既为华民所推服，又为英国官商所倚信，已成为新加坡的华侨领袖。郭嵩焘一到新加坡，中国“扬武”炮船提督蔡国祥及其弟蔡国喜已先数日到达，兄弟二人即偕胡璇泽来见郭嵩焘。通过交谈，郭嵩焘了解到新加坡一地华侨的大致情况。南洋华侨最初从事垦荒、开矿、筑路、挖河等繁重的工作，一部分华侨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积累一笔家产，而西方殖民者进行苛虐的统治，华侨商民受其屈抑，常苦于无处控诉。郭嵩焘赞赏广大华侨艰苦创业的精神，也同情华侨备受欺压的境遇。这是郭嵩焘接触海外侨民的开端。

此后，华侨问题倍受郭嵩焘的关注。使欧期间，郭嵩焘每到一地，都通过访游、公文、新闻纸等途径了解各地华侨的情况，并在日记中详加记载。他听说锡兰一带“尚有粤人贸易于此”，抵达之后，行游半日，可惜“不见中国一人矣”。自道光年间始，澳门一带开始有贩奴船贩卖华民到美洲古巴、秘鲁等地。同治十二年，清政府禁止“苦力贸易”，葡萄牙殖民者也在澳门禁止古巴船，贩卖华工之风才有所好转。但古巴、秘鲁等地已有为数众多的华侨散居，充当工役。在伦敦，郭嵩焘偶与英国驻秘鲁总领事坤丹洛同车，即问起秘鲁华侨的情况。他了解到秘鲁约有2万华人，“大率充工役，然相待犹平等，不如古巴之酷虐。惟濒海取鸟粪者较苦耳”^①。秘鲁沿海地区无雨，海鸟粪屯积数百年，取之不尽。中国人充工秘鲁，即有从事搬鸟粪的工役。郭嵩焘深知海外侨民无祖国保护之苦，因而十分关注华侨所受待遇及生活境况。他从各类资料中收集出洋华民的情况，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以“上达天听”。他统计道光至同治年间，“船运华民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六人”至古巴等地。“至哈法拿（即哈瓦那）者，

① 《郭嵩焘日记》（三），第298页。

十二万一千八百十人，其间妇女十二人而已”^①。由此可见，郭嵩焘在使欧期间重视调查侨情，关心侨民，把数百万海外华侨看成中国在海外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予以应有的关注。

郭嵩焘对广大华侨由同情而至赞赏，由赞赏而关注，由关注而深知华侨的处境和需要，其护侨思想逐渐走向成熟，并体现在一系列与华侨有关的对外交涉以及后来为设领等护侨活动中。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封建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侨民侨商以及他在使欧期间接触的一些西方人士都对郭嵩焘有重要的影响。

自咸丰年间以来，闽粤等地有匪徒拐诱农民出洋，贩卖至世界各地充当苦工，“种种苛虐，殆非人理，海禁开后，情形渐以上闻”^②。与郭同时，在福建等省任职的官员，对海外华侨的情况也有所了解。丁日昌向清政府提出二十条款建议，其中即有派使臣分驻各国，在旧金山、新加坡等华侨聚居地设立“市舶司”，扶持、发展海外贸易等内容。郭嵩焘曾致书李鸿章，论设领事之事，告之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声称：“日本各口不宜建设领事，尤不便自行管束华民，恐於两国睦谊有碍。”^③对日本公使的谬论，李鸿章在书信中予以严词驳斥。这些人关于华侨的观点，在重商、设领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对郭嵩焘当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郭嵩焘的护侨思想更多的是受西方禁买黑奴会人士和各国使领的影响。光绪四年（1878）七月，禁买黑奴会 14 人拜访郭嵩焘，商谈古巴招工章程一事。其中一位议绅郝鲁乌得言：“禁止黑奴事宜，吾在议院言之甚力，办理此事亦恰费心力，甚不愿中

① 《郭嵩焘日记》（三），第 287 页。

② 黎庶昌：《西洋杂志》，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0 页。

③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1877 年 8 月 27 日。

国复相从受黑奴之虐。”^① 郭嵩焘在国内时即闻英国禁止掠买黑奴，办理数十百年之久。此时听了郝鲁乌得的坦诚之言，“甚为感慨”。禁奴会人士为保护古巴、秘鲁等地的华工免受黑奴之苦，为郭嵩焘出谋划策。十月，禁买黑奴会 19 人再次来访。克洛弗曾在古巴充当领事 33 年，对当地情形十分熟悉，他指出所谓古巴招工会，并非善类；而定立的古巴招工会章程“酷毒如此，中国竟不能知”；禁买黑奴会听说郭嵩焘即将卸任回国，答应“但有疑难，以一书径寄本会，凡可效劳之处，必为尽力”。新、旧金山华人颇有争执，有里布尔期谛克生，曾著书论之。郭嵩焘问以“此当曲在华人”？答曰：“是其风俗好各异，彼此相形，因而起争，不能以曲直论也。”并提议设领事“不可少”。英国任古巴领事克洛法是华工的同情者。郭嵩焘在日记中记载他：“不忍华民之窘辱，常保护之，指目为香港属民。”^② 在克洛法的帮助下，大批华工由此流入古巴。这些西方人士深受近代外交观念熏陶，能够平等、公正地对待国际间的侨民问题，尤其对于当时缺乏祖国保护的华侨抱着同情。他们熟悉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能够对郭嵩焘提出一些可行性建议，并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促成了郭嵩焘的护侨思想逐渐发展成熟，而且有着鲜明的近代化趋向。

二

郭嵩焘把数百万华侨视为中华民族在海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并在国家应当怎样对待华侨的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主张。

清王朝长期推行闭关锁国政策，视华侨为“贱民”，规定私自出洋要处以死刑，并且不准华侨回国，对回国的则加以惩罚。

① 《郭嵩焘日记》（三），第 599 页。

② 同上，第 287 页。

自 19 世纪 60 年代起虽然允许人民出洋谋生，但对不准华侨回国的禁令并无明文废除。郭嵩焘作为第一个驻外使节，通过调查侨情，对华侨的地位有了正确的看法。他认为广大华侨背井离乡，出洋谋生并不是一种背叛祖国行为，认定广大华侨在海外辛勤劳作，积累家产，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支重要力量。他在日记中写道：“（新加坡）所辖斜长二百买尔之地，人民十五万，而中国多至十万人。……所以能立国，实倚赖中国人之力。”^① 在近代史上，华侨为南洋、澳洲、美洲等地区的开发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功不可没。郭嵩焘每到一地，即有当地华侨来见，诉说思念祖国之情。郭嵩焘归国途中泊舟西贡，即往侨商张宏泰、陈福基之栈行一谈，得知：“计中国人分隶法国各部及开垦地亩，共约三十万人，西贡、堤岸两处四万人，而人口税已约及三十万，其隶他部者不能详也。‘急盼中国国家为苏其困而拯其艰！’”^② 郭嵩焘体谅华侨处境，“相与叹息”。

郭嵩焘不仅视华侨为中华民族在海外的一支重要力量，还看到了华侨对国防具有重要作用。华侨在侨居地占有重要的经济地位，形成了具有较大经济实力的华侨资本。在郭嵩焘接触侨民之初，他应邀至胡璇泽家中，游览其花园风景，即目睹侨商之巨富。他在日记中详加描绘：“……奇花异草，珍禽怪兽，及所陈设器物，多所未见。”^③ 郭嵩焘熟知西方各国以通商为治国之本，广开口岸，设立领事，保护商民，与国政相为经纬。而华侨在海外经商，“中国声息全隔”。郭嵩焘在《条议海防事宜》提到利用华侨振兴国防的可能：“南洋诸岛数十，中国不能经营，洋人皆

① 《郭嵩焘日记》（三），第 807 页。

② 同上，第 812 页。

③ 同上，第 70 页。

坐而收之。所得口岸与所开辟诸岛，因势乘便，据以为利。”^①在他看来，南洋诸岛对于巩固海防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华侨缺乏祖国的保护，南洋地区被西方殖民者所控制。因此，保护华侨可以“资商贾之力以养兵”。

基于爱国思想与民族立场，郭嵩焘对于国家应当怎样对待华侨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主张在招取华工的事务中，谨慎从事，由政府派人查验，“是否出自心愿及有诬骗情事，以制准驳之权”。他还建议“定立章程”，设立使领，以国家的力量，对华侨进行保护。在归国前夕，郭嵩焘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国家之意，以民人穷苦者多，但能出洋谋食，不宜禁止，惟当立法使无受陵虐而已。”^②

郭嵩焘在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能够批判晚清政府的落后的侨民政策，把数百万海外华侨同祖国联系起来，主张力加保护，这是难能可贵的。

三

郭嵩焘出使海外，深知华侨无祖国庇护之苦。在与华侨有关的对外交涉中，他都能从维护侨民利益和民族尊严的立场出发，据理力争，在护侨活动中取得了一定的外交成果。

1878 年 6 月 22 日，英船闽粤华工向郭嵩焘使署请求拯救。这 7 名华工在英国（拉多晒）充当水手。从中国至英国的途中，他们受船主欺侮暴虐，意欲辞工。但船主不准亦不付给所欠的工值。另一杭州人汤近新也是受骗而来，没拿到一文钱，也要求辞工。接到呈控后，郭嵩焘派黎庶昌、德明前往英国查问，还率马

① 《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 1983 年版，第 344 页。

② 《郭嵩焘日记》（三），第 600 页。

格里自巴黎抵伦敦亲自过问此事。经过反复交涉，问题得以解决，7名华工获准辞职，并领取了所欠工值。对于无处谋生的汤近新，郭嵩焘还答应代他设法^①。在这次交涉中，郭嵩焘及其随员坚持原则，保护了侨民的利益，也稍微打击了长期欺压华工的英商气焰。

自19世纪70年代美国沙地党人排华开始，世界各地陆续发生了排斥华人的暴行。各地华侨遭受围攻殴打，流离失所。郭嵩焘同情华侨所陷入的孤立无援境地，深察侨民无祖国没使领馆保护之苦，并尽力在具体事务上帮助侨民脱困。光绪四年（1878），英属件尼地（加拿大）省之城哆埠，当局强行向华商华工乃至“自食尚难”的无业侨民征收重税，以至喊哆利埠华侨“群情汹汹”，联名禀报清政府出使美日秘大臣陈兰彬。郭嵩焘接陈兰彬函后，即照会英外相沙里斯百里，要求英国对待喊哆利埠华侨与待各国视同一例，“设法禁止”，以安民业。13天后，沙里斯百里照复，喊哆利埠华人派收税银事，已转核办。在这次对英交涉中，以及在太古洋行趸船移泊案、厦门渔民被英商残害案、英商虐待华工案等一系列交涉中，郭嵩焘均能从保护华工、侨商的利益出发，运用外交手段，不卑不亢，据理力争，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做出了巨大努力。

郭嵩焘使欧期间，曾到过多处著名商埠，见到“华人市肆繁如万户之邑，一水萦带，桥路四通”。在这些华人相聚成市之地，在经济上占重要地位的华人却往往受西方殖民者欺压，是以华民“急盼设立领事”。早在郭嵩焘奉命出使之初，即率先上疏朝廷，奏请在新加坡等地开设领事馆，以保护华侨。并认为胡璇泽在当地人民中有较高威信，“公正能了事”，是新加坡领事一职的合适人选。光绪三年（1877）正月十二日，郭嵩焘照会德尔贝在新加

^①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1878年6月22日—7月1日。